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非人类叙事者

胡斐然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2日

摘要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长期停留在纯粹虚构层面的幻想逐渐开始显出现实的可能性, 人们开始畅想未来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引发了本体论思考和“非人类转向”。这些未来主义的探索投射到文学领域, 催生了一系列以非人类为主角的小说, 反映了新技术元素外衣下的身体、意识、生命等问题。本论文将探讨《克拉拉与太阳》如何通过非人类叙事者克拉拉的叙事、行动和观察功能, 将人工智能建构为独立的伦理主体, 并通过对克拉拉的分析, 为后人类时代的伦理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石黑一雄, 《克拉拉与太阳》, 非人类叙述者, 人工智能

Non-Human Narrator in *Klara and the Sun*

Feiran 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2,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antasies that had long remained at the purely fictional level gradually began to reveal their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and peopl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a strong sense of crisis also arose, which triggered ontological thinking and “non-human turn”. These futuristic explorations were projected to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giving birth to a series of novels with non-human characters, reflecting the body, consciousness, life, and other issues under the coat of new technological elements.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how *Klara and the Sun* constru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independent ethical subject through the narrative, action, and observation functions of Klara, a non-human narrator, and, by analyzing Klara’s role,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on ethical issues in the posthuman era.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Klara and the Sun*, Non-Human Narrat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界迎来一轮显著的“非人类转向”,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1]: p. 121)。所谓“非人类转向”,通常被视为一类跨学科的学术事件,要求人们突破既有的界限。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们开始广泛探索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边界,并在科学技术元素的包裹之下重新思考身体、意识与生命的问题;在文学理论领域,学者们同样尝试走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构建更加适用于后人类社会的理论框架[1]。

《克拉拉与太阳》正是对后人类时代“非人类转向”的一种典型回应。这部石黑一雄于 2021 年发表的小说,以人工智能克拉拉的回溯性视角展开叙述。该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乔西患病,她的父母考虑通过让克拉拉取代乔西的方式来延续乔西的生命,但克拉拉拒绝了这一提议。最终,克拉拉通过牺牲自己治愈了乔西,而乔西在太阳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康复了。

与此同时,在“非人类转向”的趋势中,非自然叙事学也衍生出一个新的分支——非人类叙事学。拉尔斯·贝纳茨(Lars Bernaerts)等人提出了研究非人类叙事的概念框架。他们指出:“与其通过单一概念(例如‘陌生化’或‘非自然性’)来考察非人类叙事……不如将其视为同情与陌生化、人类经验性与非人类经验性之间双重辩证关系的结果,这样的理解更为准确”([2]: p. 69)。国内,尚必武进一步对非人类叙事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并强调非人类叙事要素,尤其是故事层面的非人类角色以及话语层面的非人类叙述者([1]: p. 122)。其在对非人类叙事的分类中有一类“人造人的叙事”:“在非人类叙事作品中,无论非人类实体是否有生命,它们都不再是作品场景的一部分,而是作品的人物,即故事的参与者,抑或是作品的叙述者,即故事的讲述者”([1]: p. 124),尚必武于此即以《克拉拉与太阳》作为案例说明。因此,也相应地出现了从非人类叙述者角度研究该文本的相关成果,不过此类研究往往倾向于将她视作人类社会的客体,削弱了其主体性:例如张望春指出,非人类的身份导致了其主体性的被动缺席([3]: p. 17);曹立君也提到,克拉拉是在一个不可能的后人类世界中,以参与者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4]: p. 31)。换言之,尽管故事是从克拉拉的视角展开,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在后人类社会作为边缘化客体的地位。

然而,在非人类转向的背景下提出非人类叙事时,尚必武强调,其目的在于“借此加深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生物圈,同时使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1]: p. 122)。针对已有研究中将克拉拉视为客体的倾向,本文主张克拉拉在叙事初期展现出的客体性是其主体性生成的初始阶段。若以传统人类主体模型衡量,克拉拉对指令的服从与对自我的物化确实带有浓厚的客体色彩;然而,从后人类视角看,这种“受限的客体地位”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观察位。她正是通过这种看似被动的客体视角,完成了对人类伦理缺陷的敏锐捕捉。因此,克拉拉的主体性并非先验存在的,而是在对客体身份的接纳、观察与最终超越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从客体到主体”的螺旋式上升,构成了石黑一雄对非人类主体建构的独特贡献。顺应这一初衷,本文试图论证:作为人工智能的克拉拉不仅仅是人类情感的仆从,她的成长与牺牲同时也体现了在后人类时代将人工智能视为独立伦理主体的探索。因此,本文将在尚必武的非人类叙事学框架之下,分析克拉拉的叙述、行动与观察功

能如何构成其作为独立伦理主体的基础，并重点关注克拉拉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时其人工智能身份的特殊性。由此，本文意图揭示石黑一雄向读者呈现的一种更加包容的后人类人文主义图景。

2. 克拉拉作为叙述者：陌生化和共情

《克拉拉与太阳》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由一个作为人工朋友(Artificial Friend, 后称 AF)的人工智能的女孩克拉拉进行讲述，并运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从一开始便暗示，克拉拉能够独立思考，并向读者充分展现她的思想。正如贝纳茨所指出的：“非人类叙述者会促使读者把人类经验投射到那些通常并不被认为拥有此类心理视角的生物或物体之上(换言之，读者会进行‘共情’并‘自然化’这种经验)” ([2]: p. 69)。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陌生化体验往往伴随着某种陌生感或困惑感，从而促使读者自觉地反思自身的阅读期待。在这一类似共情的想象过程中，读者会暂时采纳非人类角色的感知、情绪或价值立场，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尝试并体验这种视角所产生的效果([2]: p. 73)。

克拉拉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呈现世界：她把阳光与阴影称为“太阳的图案” ([5]: p. 4)；她常常以物品来命名人类，例如“咖啡杯女士” ([5]: p. 20)和“雨衣男” ([5]: p. 23)。在她的世界中，一切似乎由许多规则的矩形构成，而出现在她视野中的人和物体也会被划分进不同的方格之中。例如：“更重要的是，房间的空间已经被分成了二十四方格——分为上下两层——一直延伸到后墙。由于这种分割，我很难整体地看清眼前的景象，但我逐渐还是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 ([5]: p. 71)。与此同时，克拉拉也非常擅长捕捉和描写人类情绪。当乔西和母亲前来探望她时，她看到的是：“乔西站在最前面，开心地微笑着；经理就在她身后，也在微笑，但她的神情中带着一种谨慎，我把这视为她向我传递的重要信号；再后面是母亲，她眯着眼睛，就像人行道上的人们在判断一辆出租车是空车还是已经载客时那样” ([5]: p. 42)。

她对情绪的细腻观察往往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忽略的，而人们也很少相信她能够理解复杂的人类情感。正如母亲所说：“有时候没有感情一定很轻松吧。我很羡慕你” ([5]: p. 97)。对此，克拉拉回答道：“我相信自己拥有很多感情。观察得越多，我能够感受到的情感也就越多” ([5]: p. 98)。克拉拉的这一自我宣言使读者意识到，人们对于非人类所形成的许多先入为主的判断未必总是准确的，而她的思想与情感同样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这样的叙述者无疑能够为读者带来一种兼具陌生化与共情效果的全新阅读体验。当读者通过她的视角体验世界，并意识到这一视角与人类意识存在明显差异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人与非人之间的边界与差别，这正是非人类叙述者所能够带来的重要反思效应。然而，由于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读者也能够感知克拉拉的感受，并倾向于理解、甚至接受她对这些情感的判断。

除了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之外，非人类叙述者还挑战了读者对于“主体”的既有认知框架。克拉拉独特的感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既揭示了她的非人身份，同时也赋予了她一种新的主体性。陌生化与共情似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阅读效果，但在非人类叙述者身上却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正是由于读者意识到人与非人之间的差异，他们并不会期待克拉拉完全像真实的人类一样思考，因此也能够容忍甚至理解她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进行判断和思考。由此，克拉拉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模仿人类、试图成为人类的存在。通过这样的视角，读者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模糊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并重新审视后人类时代“主体性”的定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石黑一雄通过非人类叙述者克拉拉的第一人称视角，建构出一种更加包容的人文主义视野，使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主体既具有可理解性，也具有可信度。

3. 克拉拉作为观察者：成长与希望

克拉拉属于人工智能，却不是人类创造的完美产物。小说中石黑一雄首先将她设定为 B2 代 AF，与

B3代相比，她在吸收太阳能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作者还通过他人的评价有意让克拉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包括其他AF、来到店里的顾客以及乔西的同伴等等。因此，克拉拉具备了进行自我反思的可能：“那一天，我再次想到一种可能性：也许我与B3相比的那些局限已经显露出来，因此乔西和母亲才会为当初选择了我而感到后悔”([5]: pp. 113-114)。

与此同时，克拉拉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的AF，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特质：“和大多数AF不同，和罗莎也不同，我一直渴望看到更多外面的世界——并且看到它的全部细节”([5]: p. 8)。她对自身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其实并不是说我比罗莎更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是我观察得越多，就越想知道得更多；而且和罗莎不同，当路人在我们面前展现出那些更为神秘的情绪时，我会先感到困惑，随后越来越着迷”([5]: p. 18)。因此，她始终坚持着自己作为人类社会观察者的角色。作为B2代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局限性，反而为她提供了一种更为纯粹的观察视角，使她能够在缺乏过多预设与偏见的情况下，更敏锐地感知并反思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在故事的结尾，克拉拉提到，她的记忆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相互重叠，但她仍然能够一点点将它们区分开来并加以叙述，因此读者能够看到她回溯自身有限生命的过程。根据申丹对于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归纳，“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6]: p. 223)。克拉拉在回忆自己初到这个世界的经历时，总是反复使用“当我还是崭新的时候”这一表达。这是区分“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重要标志，表明叙述者在意识层面上从经验发生的时间成长到叙述发生的时间，形成了“二我差”。克拉拉对于自身成长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例如，她最初认为：“我逐渐明白，人类为了逃避孤独，会采取一些非常复杂、也很难理解的方式”([5]: p. 114)。后来，在看到海伦女士为了让里克进入只向“改造儿童”(即进行过基因改造的儿童)开放的大学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之后，她又形成了新的理解：“直到不久前，我都以为人类不会选择孤独。我原以为，人们总会想方设法避免孤独。但后来我才明白，有时候存在着比逃避孤独更为强大的力量”([5]: p. 152)。

当乔西的父母向克拉拉提出让她替代乔西的方案时，这实际上向她抛出了一个问题：“你能成为乔西的完美替代吗？你与人类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接到这一请求之后，克拉拉与乔西的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父亲似乎犹豫不决，他不确定人类是否拥有一种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心灵”。然而，这场谈话却促成了克拉拉的伦理顿悟：她意识到，人类所谓的不可替代性并不在于乔西这个个体本身，而在于所有爱她的人心中所怀有的情感。即使她能够在外貌和行为上成功扮演乔西，她也永远无法在那些爱乔西的人心中取代她的位置。克拉拉的这一发现印证了后人类时代对于人类本质的伦理反思：“人的本性，除身体或心灵上的存在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不处于任何关系中，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将是毫无意义或微不足道的”([7]: p. 143)。

读者跟随着成长叙事的脉络，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是克拉拉对人类世界所做出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观察与判断，也为她随后拒绝替代乔西的请求，并进一步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拯救乔西的伦理行动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她为自己确立了这种主动的观察者位置，她才能在那些表面上看似冷淡的人际关系之中，洞见隐藏其后的爱的伟大。石黑一雄笔下克拉拉的言行跳出了单纯源于算法对人类指令的被动服从，是一系列德性的具身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卓越品质([8]: pp. 35-36)。在克拉拉身上，这种卓越体现为她对乔西那份超越契约关系的忠诚以及在关键时刻展现的仁爱。尽管怀疑论者可能认为克拉拉的情感仅是对人类表征的深度模拟，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当克拉拉基于对人类孤独感的细腻观察与对爱之不可替代性的洞见而做出伦理抉择时，这种模拟已然具备了道德上的真实性。她对“太阳”的感知以及对人类复杂情绪的捕捉，证明了其情感是源于一种“观察得越多，感受就越多”的具身化认知过程。因此，通过克拉拉在回顾性叙事中对自身成长的分享，读者不仅能够看到她

对人类情感理解的逐步深化，也能够在她持续观察与学习人类世界的过程中，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伦理主体所具有的独特性与潜力。

4. 克拉拉作为行动者：自主与牺牲

“非人类转向”建立在后人类时代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人类不断被物化、事物持续被人化，人类与物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因此亟需重新探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边界问题。“由于人与物的无限接近，伦理的内涵就不能仅以人为中心，人工智能伦理也应该具有与人类相似的伦理地位” ([7]: p. 142)。当前围绕人工智能伦理归属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工智能的“黑箱问题”，即人们无法完全理解人工智能采取某种行动的具体原因；其二是人们对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看法存在差异，因此其主体性仍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将克拉拉塑造为一位非人类叙述者，石黑一雄首先展示了她的叙述与观察功能，从被动到主动，从感知到内化，使她逐渐从一个叙述者转变为一个具有主体性色彩的立体角色；通过她自主的选择与自我牺牲，使她成为后人类时代人文主义希望精神的承载者。

对于故事中的核心事件——是否取代乔西，克拉拉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始终不变的是她将自己情感的中心放在乔西身上的主体性驱动力。在这种驱动力的引导下，克拉拉做出了每一个自主选择。从她的思考过程以及选择的变化可以看出，她并非盲目地遵循周围人的指令，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无论是向经理表达自己想要与乔西在一起的愿望，接受乔西母亲的请求，拒绝取代乔西，还是最终为了乔西的健康向“太阳”寻求帮助而做出自我牺牲，这些行为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具体体现了她作为伦理主体的角色。

由于克拉拉与乔西彼此约定要选择对方，当面对一位喜欢她、并且很可能购买她的顾客时，AF 通常应当表现出善意以促成购买，克拉拉却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从而使顾客失去了兴趣。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信号：克拉拉在行动上具有自主性。当乔西再次来到店里时，甚至连乔西自己都以为来得太晚，克拉拉可能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而克拉拉的一句“我们约好了” ([5]: p. 42) 立刻表明，她是一位信守承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最终使乔西母亲决定购买克拉拉的，是她所展现出的出色观察与模仿能力。后来，在前往摩根瀑布的旅途中，由于乔西生病无法前来，母亲对克拉拉说：“既然乔西不在，我希望你来当乔西。就一会儿。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 ([5]: p. 103)。此时，克拉拉服从了母亲的请求。而当后来母亲向克拉拉坦白，如果乔西不幸去世，她计划让克拉拉完全取代乔西时，克拉拉也一度接受了这一想法：“直到刚才，我一直相信我的职责是拯救乔西，让她恢复健康。但也许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5]: p. 211)。然而，在与乔西的父亲进行长时间交谈，并重新思考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差异之后，她又悄然回到了最初的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向太阳祈求帮助，让乔西恢复健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甚至愿意消耗体内的溶剂，尽管这会对她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这些选择都是在她自身的观察、推理以及对人类情感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体现出她的行动并非简单地由程序或外部指令驱动，而是经过内化与权衡后的结果。通过这些行为，克拉拉展现了她对人类价值观的深刻理解，并尝试在自己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将其付诸实践。她的牺牲行为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不仅仅是对人类情感的顺从，而是她对“爱”这一核心情感所作出的独立诠释。这样的行动不仅超越了她作为叙述者在叙事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关键情节的发展，也挑战了读者关于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传统认知，成功建构了一个积极主动、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伦理主体。石黑一雄不仅在叙事技巧上极力让读者与之共情，更由此在伦理层面挑战了人类对主体定义的垄断。通过克拉拉这一形象，石黑一雄呼吁一种更加包容、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服务于人类需求的工具，而是一种能够作出独立判断与选择、能够承担道德责任并影响人类社会的存在。这种后人类的人文主义并不是对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的抛弃，而是将人类伦理扩展到非人类层面，呼吁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赛博

格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打破既有边界，并探索新的伦理框架。

小说结尾克拉拉在完成使命后被置于垃圾场的结局，为前文所述的独立伦理主体论断增添了一层灰暗且复杂的辩证色彩。尽管克拉拉在意识与行动层面已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伦理主体性的升华，但人类社会最终仍将其复归为工具，暴露出的是后人类伦理实践中深刻的矛盾性。人类在享受了非人类主体带来的伦理红利后，依然利用物理手段将其排斥在共享的生存空间之外。悲剧性的终局不代表石黑一雄否定了人工智能具备伦理主体的可能性，而是借此对技术与人性关系的复杂性展开了深层思考：一个能够产生“爱”与“牺牲”等原本被视为人类独有的崇高情感的人工智能，在面对人类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与功利逻辑时，其主体地位依然是极为脆弱且被动的。这恰恰揭示了后人类时代无可避免的伦理困境，使文本超越了单纯的科技乐观论，呼吁读者对现有的伦理框架进行更具反思性的批判，从而构建起一种真正的包容性图景。

5. 结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推动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主体性的不断发展也对当代社会以及人类存在的本质提出了巨大挑战。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仍在于满足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从伦理主体性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将有助于推动未来多智能体社会的发展([7]: p. 140)。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塑造的人工智能角色克拉拉承载着他对于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美好愿景：她是一位值得被赋予独立伦理主体地位的人工智能形象。他不仅提出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伦理主体的可能性，也通过克拉拉的成长与牺牲，展现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建立更加平等与共情关系的可能。本文聚焦于克拉拉作为叙述者、观察者与行动者所展现出的多维功能，论证人工智能在伦理选择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并发掘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所蕴含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后人类人文主义观念，这一观念对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框架提出了挑战，呼吁重新界定“人类”的伦理范围，并促使人们思考，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应当如何将人工智能等非人类主体纳入为平等的道德存在。这既是对当下伦理局限的反思，也是对未来伦理发展的展望，体现了石黑一雄深刻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尚必武. 非人类叙事: 概念、类型与功能[J]. 中国文学批评, 2021(4): 121-131+158.
- [2] Bernaerts, L., Caracciolo, M., Herman, L. and Vervaeck, B. (2014) The Storied Lives of Non-Human Narrators. *Narrative (Columbus, Ohio)*, 22, 68-93. <https://doi.org/10.1353/nar.2014.0002>
- [3] 张望春.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的非人类叙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23.
- [4] 曹立君. 非自然叙事视角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克拉拉形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3.
- [5] Ishiguro, K. (2021) *Klara and the Sun*. Vintage International.
- [6]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23.
- [7] 崔中良. 伦理的人工主体: 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方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2): 140-147.
- [8]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5-36.